

包容
开放
自信

□
謝
冕

——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

□
雷
达

知识分子叙事的新维度

中国文艺批评的复兴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带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也带来了文艺批评的春天。而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的天空始终充满着阴霾和雷电。要是我们不健忘，我们应该会想起当年一部电影的锣鼓，一声“文学是人学”曾经引来多大的风暴，不用说真名了，更不用说抗辩，包括胡风先生的《三十万言书》在内，一切都无济于事。时代不给机会，时代只允许沉默。于是，除了那些不幸的罹难者，幸存下来的总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个历史事实，与我同时代的人们都是见证者，其中有些人甚至是亲历者。我们无一例外默默地加入了这个庞大的队伍。在那些漫长的年月中，也许我们不曾绝望，但却也不敢有希望。我们只是小小的种子，也许我们怀有小小的生机，但是冰雪无情，我们的命运只能被覆盖，被掩埋，在严寒中窒息。而春天就这样奇迹般地出现了，我们都是春天的蒙恩者。久违的春天无声地承诺给我们比起我们的前辈们更多的机会。温暖的时代，激情的岁月给了我们言说的自主，特别是按照个人意愿言说的自主。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智慧或是有多么深厚的涵养，只是因为我们拥有了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阳光和雨露。

我们要感谢家乡福建给予我们的一切。是家乡的水土养育了我们；是家乡的历史教育了我们；是家乡的文化传统培养了我们。感谢福建，感谢福建的大地、天空和海洋。福建多山少耕地，远离内陆，交通闭塞，历来是贫苦的。因为北边山脉没有通途，为求生路，人们只能向着海洋。福建人下南洋就犹如北方人走西口、闯关东。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则成了福建人谋生和创业的道路。福建人在这些地方创业，也参与了地方建设，在与当地人的共生共融中，学习了他们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同时也播扬了中华文明的种子。福建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养成了包容、开放、不排斥新物的文化心态，诸如陈嘉庚这类的华侨领袖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福州作为中外文明的交汇点，聚集了大量的国外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他们带来的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化大大扩展了福建人的眼界和心胸。福建人对这些闯入者既不漠视也不抗拒，而是以平静的心态接纳包容他们。我自小生活在福州的南开岛，那里是西方文明的集结地，有着教堂、赛马场、咖啡厅、西餐、舞厅以及更多的医院和教会学校。西方有的我们都有。我中学时期和张勇就读的是英国人办的福州三立中学。最近我在牛津和爱丁堡都找到了三立的姊妹学校。陈景润也是三立的学生，他高中是在美国人办的英华中学就读。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受到一种或者多种域外文明的广泛熏陶，它们就像中国传统一样，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并成为我们内心祭奠的一部分。

当然，更多的影响则是来源于我们的先辈，我们虽然与他们时间错置，但拥有同一片天空。我们时刻感受到他们的呼吸和体温以及飘浮在八闽大地的无所不在的他们的精神气概和英雄光辉。从林则徐到林纾，从严复到林语堂，近代以来，众多的福建文士，他们精通古典且深谙当今。他们通过引进域外小说以及直接阅读外文写作的特殊方式来了解西方文化。这里的外文写作，主要是指林语堂，但是最近陈季同受到了注意。陈季同是晚清人，他在船政学校学习，精通法文，曾经用法文写过8本著作，内容涵盖散文、小说和戏剧。特别是对于小说《黄衫客传奇》，严家炎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现代新文学色彩的作品。陈季同的外文写作实际上将现代文学史向前推进了十几至二十年。所以更多的了解西方，表达我们的交流，展现我们先辈的视野和胸襟，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凝视。壁立千仞，是他们给我们的骨骼；海纳百川，是他们给我们的境界。我们也许不曾继承他们的智慧，不曾达到他们的学养，但我们神往于他们自由开放的心态。

当然，更多的影响则是来源于我们的先辈，我们虽然与他们时间错置，但拥有同一片天空。我们时刻感受到他们的呼吸和体温以及飘浮在八闽大地的无所不在的他们的精神气概和英雄光辉。从林则徐到林纾，从严复到林语堂，近代以来，众多的福建文士，他们精通古典且深谙当今。他们通过引进域外小说以及直接阅读外文写作的特殊方式来了解西方文化。这里的外文写作，主要是指林语堂，但是最近陈季同受到了注意。陈季同是晚清人，他在船政学校学习，精通法文，曾经用法文写过8本著作，内容涵盖散文、小说和戏剧。特别是对于小说《黄衫客传奇》，严家炎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现代新文学色彩的作品。陈季同的外文写作实际上将现代文学史向前推进了十几至二十年。所以更多的了解西方，表达我们的交流，展现我们先辈的视野和胸襟，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凝视。壁立千仞，是他们给我们的骨骼；海纳百川，是他们给我们的境界。我们也许不曾继承他们的智慧，不曾达到他们的学养，但我们神往于他们自由开放的心态。

当然，更多的影响则是来源于我们的先辈，我们虽然与他们时间错置，但拥有同一片天空。我们时刻感受到他们的呼吸和体温以及飘浮在八闽大地的无所不在的他们的精神气概和英雄光辉。从林则徐到林纾，从严复到林语堂，近代以来，众多的福建文士，他们精通古典且深谙当今。他们通过引进域外小说以及直接阅读外文写作的特殊方式来了解西方文化。这里的外文写作，主要是指林语堂，但是最近陈季同受到了注意。陈季同是晚清人，他在船政学校学习，精通法文，曾经用法文写过8本著作，内容涵盖散文、小说和戏剧。特别是对于小说《黄衫客传奇》，严家炎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现代新文学色彩的作品。陈季同的外文写作实际上将现代文学史向前推进了十几至二十年。所以更多的了解西方，表达我们的交流，展现我们先辈的视野和胸襟，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凝视。壁立千仞，是他们给我们的骨骼；海纳百川，是他们给我们的境界。我们也许不曾继承他们的智慧，不曾达到他们的学养，但我们神往于他们自由开放的心态。

从这一点讲，闽派文艺理论批评给我们的启示，正是变革与创新。以“朦胧诗”为例，刚开始，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的诗人们的诗作，虽然在诗歌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尚未有理论上明确的命名和确认，更没有此后以“朦胧诗”诗群出现的自觉性的诗歌流派以及当时艺术上高峰期喷发的一种状态。其间以谢冕、孙绍振为代表的两位诗论家，分别在80年代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和《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种理论上的推动表现了理论界对创作现象的极度关注，同时，在理论观点和批评表达上也极具创新，是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创造性表达。改革初期，当时各个领域都处于变革阶段，诗歌创作中的变革与创新，由两位闽派文艺理论家发出了先声，是他们敏锐地发现了这种文学创新，他们的诗论直接影响到当时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并从诗歌领域溢出，扩展到整个文学界，有力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是创作对理论的启发，也是理论对创作的带动，是互动和双赢，真正达到了理论和创作相互扶持、惺惺相惜、彼此欣赏、相互推动的水乳交融这样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不是孤例，更不是幻想。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30多年前，它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就在我们身旁。再比如，张炯2012年出版的专著《先进文化与当代文学》，由课题组成员及他本人撰写各章，但全书整体思路及修改审定都由张炯完成。其中第三编“文艺思潮与文学”，在专章论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后，专辟一章，第十二章论述“女性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从20世纪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到女性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影响等都做了扎实详尽的述论与求证。作为男性理论评论家，能将女性主义思潮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思潮并列，并将其抽离出来做相对重点的论述，显示了对理论前沿问题的敏锐的探索精神，同时也体现了理论家在男性话语为中心的语境下展现出来的一种开阔的视野和从容的胸襟。而将这一话题放入先进文化和当代文学的旗下，更显露出理论家的理论勇气。

张炯长期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述亦具深远的现实意义。但是他本人同时又关注女性文学的发展，尤其对新时期女性写作和女性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他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时就不遗余力地推动和设立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张炯还亲任第一届会长，有力推动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同时对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有极大的促动作用。陈骏涛也是如此。近年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讲，离不开闽派理论家批评家的大力扶

持。关于这一点，厦门大学的女性文学研究者林丹娅比我更有发言权。

还有南帆，一手散文一手理论，且两者都获得过鲁迅文学奖，他的理论我不多言，但他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使他的理论疆域不断得到扩展，他对于理论的探索热情往往溢出书卷而进入到社会学的层面，比如对当代农村的观察和研究。他将对现实的兴趣和对书斋的理论兴趣结合起来，传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关怀精神，包括谢有顺，其对小说和伦理学的结合研究我认为都溢出了单纯的文学、文艺而进入到思想的层面。陈仲义则尝试使用工程学、建筑学的一些东西来研究诗歌。这使我想到新时期伊始，刘再复的文学研究对哲学的引入，林兴宅对“系统论”等数学的引入，这都表现了一种文学理论的超越性努力与跨界性的特征。文学理论往往交织了很多新的前沿学科，而且它有一种兼容性，对其他学科的发展非但不抗拒，而是愉快地接纳。这种开放的思维，可以说在一个时期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文艺理论事业的发展，我们不再单纯地以某一种视野或某一种话题来进入文学，而是以一种“面”的形式来进入。所以我认为跨界性在闽派文学批评中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在文艺理论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中，闽派的理论家批评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文艺理论的变革与创新对于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我说过这种现象不是孤例。为什么闽派的文学理论家会如此敏感呢？刚才我们探讨了朦胧诗、主体性和方法论的崛起，为什么每一次都是由闽派理论家、批评家提出来，而在讨论之后，不仅推动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而闽派理论批评家的队伍也开始迅速的扩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闽派理论批评与其说是一个流派学派，不如说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理论批评界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为什么数次的理论创新与变革都由他们发起，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闽派理论家的“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呢？我认为谢冕所谈到的“时代”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文艺理论和批评革新的前提应该是时代的革新，改革开放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话语场，使我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大胆地设想，是思想解放的时代给了我们发挥理论批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无限的空间。其次，我认为闽派理论家“敢为天下先”的原因还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是多种文明的交汇。这当然要从近代史上去寻找起因，闽地，看似四面环山，却绝不出封闭，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以及近代西学东渐的思想影响，造就了它在近现代的人文底蕴，严复、辜鸿铭、林纾、林语堂、郑振铎等在思想界的影响，以及林徽因、冰心等在创作界的影响，均为此后闽派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成长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人文环境。人文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闽地崇尚学理，故而有贡献的理论家、大思想家的土壤又滋养了一批卓有贡献的理论家、批评家。在理论批评史上，思想史上，这种人文精神所具有的坚韧的生命力，是我们在今天的文学理论界仍能不断听到闽派理论家发出独有声音的一个

文艺批评的价值与坚守

□周 星

批评话题由来

批评而能有会聚的机会，显然是提醒自己，批评是一种学问也是一种职责，批评家意识的强化不亚于理论家的重要性，或者说批评家就是兼具理论家的责任和应得的荣誉。我想从前一段大学生看话剧经典《雷雨》笑场，和南方的三坊七巷以闽剧穿比基尼来吸引青年受众说起，以此来看待批评家应当具有怎样的观察眼光，和对于社会文化的态度。近期关于《雷雨》演出笑场的议论，引发人们的不同读解，似乎站在传统和现代相反的认知，都有其自身逻辑道理。经典话剧人解当下大学生不能沉下心来理解剧作的深刻悲剧，辩护者则认为时过境迁，舞台上如果没有现代意识岂能要求大众接受？但在我却想得更多。比如，一定有一个时代观赏的转变问题，能够超越时代的不变经典，也未必强求后来者一成不变的沿袭接受，而况新的网络时代观众的认知绝对大大不同于以往，他们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模式将是别样的，犹如以往欣赏经典是一种自身素养，现代人的笑声也一样是这一代人的自然发笑，愤怒的指责不无道理但笑场的自然却出自于时代的语境变迁。至于演出是不是与时代俱进则遭遇难题，我们看到西方世界强调严格遵守古法演出，考验的是人的素养养成，但其实1917年杜尚的市场购买小便池就改变了美术上的经典，也似乎说明与时代俱进艺术和经典艺术之间没有截然的鸿沟。而最为关键的还是受众的变化。经典的素养取决于世代传承的积淀，贵族气息的养成则遇到现代人文化膜拜的改变。既没有小时候的经典阅读，也不需要文化修炼的培育，自小就是网络所带来的另外一套系统的语言熏染，诸如“小鲜肉”、“长腿欧巴”、“淫才”这样娱乐文化的表达，让他们如何静心体悟经典的深层含义？

无论如何，批评家需要具有自己的社会文化思考。至于为了吸引年轻人而让传统戏曲穿比基尼的举措，似乎出发点合理，且不说方式上显然属于剑走偏锋，而目的是取悦大众，就实质而言，显然无助于戏曲普及，增添的是坏毛病而更为远离戏曲含蓄体味的精神。实际上，这还是一种投机取巧和行为乖张的表现。文艺批评需要敏锐抓取关乎文艺走向的敏感问题给予分析批评。

所以，我以为的文艺批评是一种针对文艺现象，特别是鲜活的当下文艺形象表现对象的具有理性和激情交融的评判。不同于文艺理论的学理逻辑表述需要严整而理论概念和层阶性，文艺批评是深藏理论、关注现实、大小现象都可以击其要害而强化批评，所以它天然具有文化议论的雅致气息，品位气度的高低俯仰皆成文章。高——批评可以让文人细心琢磨，低——评判可以让大众惊讶兴奋。于是批评家的犀利敏锐和理性逻辑，与针对性现象的独特个性认知合体，构成批评成为一种文化阅读对象的本源，而批评文本的独立价值又兼具有理性思维的逻辑和形象思维的情感鲜活个性。文艺批评的不断切中时代文化之弊和得失的感知，又构成独立存在的文化现象，每一次引起社会关注的多半和文艺批评相关。而文艺理论观念的传扬和渗透，文艺批评功不可没。

文艺批评绝对是时代文艺现象的放大镜和聚光灯，其警示和影响更为重要。于是，文艺批评不能忽略现实现象也不能固守以往，应当随着时代文艺现象和潮流的变化而不懈追踪。以往人们说的时时代文艺尖兵和护卫者即是也。是不是敏锐，有没有嗅觉，能不能看到文艺现象呈现的时代风云，以及是否具备理论素养等等，都是考验文艺批评者的要素。时代的文艺现象变幻莫测，但根源在于时代风潮和社会人心波动是必然的。而如今——大众观众转向娱乐，批评如何介入是一个问题。市场取舍对于艺术行业的影响，产业态势和艺术表演的关系，创作改编之间的得失等等，都需要批评的关注介入。

不言而喻，文艺批评创新是与认知文艺批评状态相联系的。文艺批评遭遇境遇变化、对象变化、受众变化和批评话语变化的现实，而根本是文艺批评的性质没有变化。

然而，文艺批评是一个时代文艺巨变似乎更为必要却实际有些无能为力的对象。电影的“小时代”弊端正在艺术和文艺界沸沸扬扬地争论不休，清华大学教授的急眼批评让人们大跌眼镜，原来文艺批评也未必不是情感用事。

如何看待解释？似乎没有人愿意来义正词严的对应，其实义正词严缺少了可以针对的环境。标准是什么？权威有吗？关键的是凭什么来判断和判别信服度在哪里？

于是需要提到当下文艺批评的境遇。文艺的范畴是不是有了变化值得思考。对电影《归来》议论批评的相当多的文艺批评家，因为来自于小说而呈现在电影，受众众多的大众议论势不可挡，批评不只是在传统纸质媒介中，而是从广播电视到网络留言、微信朋友圈等等。拿着一种媒介的要求去量度另外的媒介文艺作品的合理性需要辨析。这里，创作的跨媒介和融媒体传播批评新媒体时代的受众，融媒体的传播，祛魅的时代走向，文艺创作的标准等等都有待厘清。

随着时代变化，我以为文艺批评需要把握面对与超越，变通与坚守，大时代精神与小时代观照的结合。从观念上看，面对现实巨变的眼光，不能顽守一成不变的既有规则意识，需要有把握大时代前行的精神，才能具有文艺批评的本质特征和现实性，是踏实指向的而非海阔天空的玄想，让文艺批评脚踏在文艺现象的丰盛土地上。但同时，文艺批评要有“超越”世俗的精神，显示睿智的思想观照，要有“坚守”人文精神的高端性，为自身生存也为文化必须把持的理念而高昂头颅，要有切近小民的小时代情怀与善意理解的自然性，不为了显示高雅而与大众认知格格不入。

文艺批评既要独守自身的根基，为文艺的精神葆有而坚守，但也必须警惕自身孤高自傲，批评必须独特但不能狭隘，建立在建设性基础上的批评独特才有厚重感和动人性，哪怕落魄孤独未必不是一种风景。最近看到报载基于谷歌搜索软件，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是世界上出镜率最高的地方，这提示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移动媒体时代和大数据基础上的文艺批评更应该具有新的眼光。

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上溯到更早的古代历史。古代中原文化、儒家文化对福建的影响，大家之前也谈到朱熹和李贽等等，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再展开论述。福建人的血脉中流淌着古中原人的血，这是历史造就的，所以闽人虽为南人，但却有北人性格中的执拗与刚烈，这种影响是文化血缘中的一种影响，它也是潜移默化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根基在这里保存的非常完好，没有受到战乱的干扰。它就像福建的古建筑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一样，我认为文化的东西不一定是有形的，它大多数时间存活于在我们血脉中，是一种文化基因。我们都携带着它，将它植人我们的文字和判断中。这是闽派理论家在葆有雄辩的激情同时，也能深具缜密的考证的缘由。

第三是当文化风云际会与沟通交流。是时代赋予了中西方这样一种交汇，使得闽派能够得地理人文之先，发挥其“交响”作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造就了闽派批评的思路宽广且思维活跃，像孙绍振和谢冕先生对于新风潮就具有非常敏感的接受能力，能够将之变为一种理化创新性与现实文本、艺术风尚的结合。上世纪80年代，闽地办有《当代文艺探索》杂志，集聚了闽派理论批评的力量，在当时的文论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探索精神也一直是它所倡导的，所以在雄辩的激情与缜密的考证同时，闽派理论还具有鲜明的立场与别致的文风等特点。

还有一点，无论是诗论、文艺理论还是现实主义的批评或如陈晓明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它们都是多样化存在的，闽派的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现象，也是它的包容性的一种体现，同时，它也有可持续性，比如李书磊讲到的闽派理论家的“四世同堂”现象，从80岁仍笔耕不辍的老理论家到陈思他们一代的“80后”新生力量，每一代都有一种延续血脉的代际传承关系。代与代之间没有断裂，且能相互尊重，呈现了闽派理论的敏锐性、开拓性、跨界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但在这众多特点中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闽派理论批评的真性情，文字写到最后写的是写文字的这个人，理论、判断、认识与思想说到底其实是理论家本人的一种人格、性情的外化。我们虽然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观念，但是写到最后一定是一种性情。在闽派理论批评中，我看到了非常真实真诚的一种性情，一种忠实于文艺发展规律的，忠实于理论批评精神的性情。是这种真性情，支撑了它的敏锐与跨界，开拓与包容，是这种真性情，使得它能够在30多年之后我们再回望闽派理论家的贡献之时，还能够从文学理论史的意义上予以定位与评价。我尚记得古远清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曾专设一章论“闽派”评论家，他称之为“文艺研究新思维的张扬者”，我以为是恰切的。我想这种“张扬”同样也来自于这样一种对理论、对真理敬畏之并追寻之的真性情，在此，在闽地，请允许我作为一个中原人、一个后来者对这样一种真性情表示致敬。我也愿意借闽派文艺理论批评这样一种血脉来延续我所从事的理论批评。

最近，曾红极一时，独领风骚，用小说启蒙过一代人的作家张贤亮离世，使人们追忆起那个理想奔涌与思想启蒙的1980年代，而张贤亮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书写也再次成为谈论的话题。人们发现，在他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书写变得零零落落，几成断裂之势。可喜的是，一部知识分子题材的新长篇《荒原问道》来了。

它的作者恰好是西部作家。很多评论家都谈到这部小说与张贤亮小说的关联。在我看来，《荒原问道》不仅续接了张贤亮等作家一直书写的知识分子主题的传统，而且比那一代作家有了更为广阔的开掘。它是近期出现的一部在主题上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且意蕴独特、容量甚大的精神成长性长篇小说。

小说一开始写道：“在远赴希腊之前，我再一次漫游于无穷无尽的荒原之上。我先是去了一趟曾经支教的甘南州迭部县的藏区。那是尚未被开发的地方。一路上，又一次看见亘古的河流，又一次目睹迭山的万壑，而巨大的鹰在头顶盘旋。”这样的景物描摹，何尝不是我所熟悉的西部：甘南、迭部、阿拉善、河西走廊、青海高原、戈壁、沙漠……多么熟悉的山河！反右、双子沟、“文革”、红卫兵、毛泽东逝世、高考、80年代、思想解决运动……这又是多么熟悉的人生经历。

阅读这部小说，我仿佛在阅读我自己，置身于我们那一代人的精神旷野。它不仅使我想起自己在甘肃生活、学习和游历的诸多情景，想起我在“四清运动”时到河西走廊下乡时的种种记忆，而且使我不自觉地想起1980年代至今的一些著名文本。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高爾泰的《寻找家园》等等。我猛然发现，这些作家和文本，几乎都诞生在西北。反过来说，这些主题一直就在西北那片辽阔而悲壮的大地上繁衍生息。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作为后辈学者的徐兆寿就天然地继承了这些精神，受到他们的熏染和启发。当我们摸准小说的内部肌理之后，就会发现有大量作者独立的、新鲜的、深刻的生活体验，而且是站在今天，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信仰、价值和精神追求，它的意义是面对全民族的，是对整个社会精神归属和灵魂安顿的思索。

现在看来，张贤亮那一代作家因为其自身的人生经历、历史思考以及其接受的俄苏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使他们的文学书写主要表现在对政治文化的深刻思考与批判上，以此来反抗那个时代政治统摄一切，极左政治迫害知识分子的情境。后来的杨显惠也受其经历、文学观念的影响，对身处夹边沟右派的书写仍然集中表现在对政治文化的强烈批判上，他笔下的人物也因身负历史重压而步履沉重。他们的书写可以归于政治叙事方面。但是，作为1960年代末出生，1980年代成长，1990年代后逐渐成熟的徐兆寿来说，他的人生经历中就缺少了政治的强大干预，形成他思想主脉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以及后期逐渐兴起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他的文学观则由1980年代消彼长的先锋文学观念、文学史上的各种观念以及“五四”以来始终占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等构成，极为复杂。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徐兆寿的《荒原问道》在风格上既有浪漫主义的倾向，又有现实主义的理性；既有现代主义的荒诞，又有先锋叙事的种种尝试；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命运叩问，又有对西方文化的思索批判；既有对集体主义理想的书写，又有对个体理想信仰的探索。所以，虽然主人公之一的夏好问也经历了如同章永麟一样的政治迫害和人性扭曲，但是，夏好问的思考就比章永麟要广博、复杂了许多。章永麟思考的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夏好问思考的是中国化的命运、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同时，徐兆寿还塑造了一个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陈子兴，又名陈十三。在这个人物身上，又表现出比章永麟走得更远的思考，文化、心灵，也更为广阔地表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在陈十三的身上，我们看到类似于米兰·昆德拉式的现代思考与追问。这使得这部小说超出了之前知识分子的书写，而直接融入世界文学对知识分子书写的洪流之中。

从艺术表现上来看，这部作品同样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受难史，这是它的主骨架，但是它的背景却十分广阔。从校园到乡村，从荒原到都市，从苦难到异化，从专制到精神的失落，广泛地思考生命、时间、生死、幸福、生存、性爱等问题，作者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思考融汇到这部小说中，使得小说表现出恢弘的气象。它的外在结构，即半个世纪苦难的命运，以夏木为最。背后的事件是我们知道的反右、困难时期、文革、思想解放、新启蒙、市场经济，写历史怎样造就了一个孤独的思想家、精神领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是人云亦云地去写流放、藏匿、逃亡，继续《牧马人》的模式，而是为我们打开了